



船 夫 著

(1979—1989)

十年学潮纪实

● 1979——校舍骚动

● 1980——竞选风潮

北京出版社 船 夫 著

十年学潮纪实

● 1985——新“九一八”

● 1987——元旦震荡

● 1988——阿柴事件

● 1989——北京风波

十年学潮纪实
Shinian Xuechao Jishi
(1979~1989)

船夫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09000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6,001—45,900

ISBN 7-200-01243-2/K·111

定价：4.20元

致读者

目录

1979年至1989年这10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取得巨大成就的10年。但是，由于国际和国内大小气候的影响，又由于大学是一片“多雨的云彩”，因而伴随10年改革开放的脚步，学潮时起时伏，并在1989年最终发展为社会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笔者亲身经历了这10年中发生的主要学潮，并搜集了不少有关史料，据此写成本书，希望能够帮助读者了解其概况，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由于笔者材料所限，这本书仅以北京的学潮为主，兼及全国，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1989年12月26日

目录

第一章 校舍骚动	1
第一节 新时代	1
一、理性在苏醒.....	1
二、科学文化的春天.....	7
三、百业待兴谁为先.....	11
第二节 矛盾突发	13
一、一号难题.....	13
二、人民大学的信号.....	18
三、大字报——罢课——游行.....	20
四、惊动了四面八方.....	31
五、问题不仅在学生.....	36
六、连锁反应.....	37
第三节 问题的背后	41
一、矛盾为何激化了.....	41
二、从学生上街看社会.....	44
第二章 竞选风潮	47
第一节 树欲静而风不止	47
一、布朗运动现象.....	47

二、必要的调整	54
三、政治体制改革未雨绸缪	56
第二节 狂飙般的运动	59
一、困惑种种	59
二、打破常规	60
三、暴露了什么	71
四、唇枪舌剑议中国	73
第三节 严肃的启示	80
一、一次早夭的民主试验	80
二、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	83
第三章 新“九一八”	87
第一节 打破平衡的砝码	87
一、改革呈现艰难	87
二、日本到底是谁	89
三、校园中的缺口	93
第二节 纪念的歧义	102
一、“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102
二、在这敏感的一天里	108
三、不变的主旋律	112
四、校园难归宁静	118
第三节 同情与责备	123
一、谁人不爱国	124
二、远瞩须高瞻	126
三、民主的真谛	128

第四章 元旦震荡	131
第一节 震前景观	131
一、众望归一的“兴奋点”.....	131
二、逆流扑面而来.....	135
三、不断躁动的情绪.....	137
第二节 南北共震	142
一、来自南方的冲击.....	142
二、北京的反响.....	146
三、“示威去”.....	156
第三节 震后思考	164
一、学生们怔住了.....	164
二、问题出在哪里.....	170
第五章 阿柴事件	174
第一节 偶然中的必然	174
一、“水过鸭背不透毛”.....	174
二、从“救世主”到“救自己”.....	178
三、到天安门广场擦皮鞋.....	182
第二节 从刑事案件到政治事件	186
一、柴庆丰被害.....	186
二、借题发挥.....	190
第三节 流产的示威	198
一、“东风压倒西风”.....	198
二、平静的星期三.....	203
三、完了?.....	206

第六章 北京风波	216
第一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216
一、西方的“软着陆”.....	216
二、滚滚寒流急.....	217
三、祸起萧墙.....	222
第二节 在祭奠的旗下	224
一、导火索.....	224
二、“最来情绪的”冲击.....	227
三、跪交请愿书.....	230
第三节 “4·26”社论前后	234
一、一叶知秋.....	234
二、“高自联”一瞥.....	236
三、旗帜鲜明的表态.....	239
第四节 动乱升级	243
一、中央的两种声音.....	243
二、舆论界怎么了?.....	246
三、“5·13”大绝食.....	249
四、真假关心.....	253
五、乌云压城.....	256
第五节 发布戒严令	262
一、重重阻挠.....	262
二、“国中之国”.....	265
三、拼死挣扎.....	267
四、“反腐败”?.....	270
第六节 血染京都	277

一、是谁燃起暴乱之火·····	277
二、暴行令人发指·····	279
三、广场的悲与喜·····	283
四、从无序到有序·····	285
结 语 ·····	291
●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291
●大跃进式的民主实践必致动乱·····	295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持之以恒·····	300
●警惕“和平演变”·····	302
●“这个党不抓不行了”·····	306

第一章 革命年代

第一节 政治风波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果断地，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北京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随后，中央又发动了“批人帮”在上海同造反派保派的武装暴乱，并迅速将造反派“批斗”到香港和宝岛，利全国人民。自此，历“10年

第一章 校舍骚动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恢复了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新一代大学生戴着令人羡慕的校徽走进了大学的校门。但是，校园的生活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待解决；与此同时，在思想解放浪涛的冲击下，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也相伴而生，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反映在大学校园中便形成了躁动不安的校园小气候，使之成为中国异常敏感的社会神经。因此，1979年10月，北京发生了由校舍问题引发的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体的学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首次学潮。

第一节 新时代

一、理性在苏醒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北京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随后，中央又处置了“四人帮”在上海的追随者预谋发动的武装暴乱，并迅速将粉碎“四人帮”事件通知全党和全国人民。自此，历时10年

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由于长期“左”倾路线的影响，相当多的人们的思想仍然被禁锢在“左”倾教条主义的藩篱中，并未意识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正在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移。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仍然被继续贯彻执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中首次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提出，说明“左”倾僵化思想仍然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占据着主要位置，其在实践中贯彻的结果是十分有害的。一方面，由于“四人帮”打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号干了很多祸国殃民的坏事，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要求就无法予以揭发批判，“文革”中的大量冤、假、错案就无法重新审查、平反。另一方面，对形成于50年代末、大大发展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也无法进行批判和反思。思想和路线是非无法澄清，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就很难统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无法实现。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不仅需要政治上、组织上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更需要从思想路线上发动一场拨乱反正的重大斗争。

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稍后，邓小平同志又在党中央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而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上来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还列举了大量实例来说明，毛泽东同志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对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如果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把毛泽东同志的话奉为“句句是真理”，就会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甚至割裂、歪曲、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了他既勇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某些现成结论的实事求是精神，打开了解放人们思想的闸门，成为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理论武器。

在邓小平同志重新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第一声号角终于吹响了。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这篇文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新华社于当日全文播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发。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凡是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研究现实的确切事

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如同一声惊雷，在凝滞已久的中国大地上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于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持续10年之久的万马齐喑的局面终于被万马嘶鸣的新景观所代替。沉睡多年的理性开始苏醒了。

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他认为：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他批评“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强调：“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任务。”这个讲话，无疑是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强有力支持。

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广大理论工作者冲破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重重障碍，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结合林彪、“四人帮”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大搞反革命活动的实际，从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用深入的理性分析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歪

曲、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极大危害，发挥了思想解放先锋队的作用。

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同志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其中提出了“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文章认为：党内出现林彪、“四人帮”这样的反党集团，而且他们能隐藏得这么深，造成这么大的危害，从党内生活来检查，同民主集中制不健全是有关系的。文章还强调：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把党内党外的民主生活活跃起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切实实行“三不主义”。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叶剑英、胡耀邦、胡乔木等同志从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提出了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意见和建议。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其中谈到：

“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

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上述重要的思想观点实际上成为贯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的基本精神。

在思想解放洪流的冲击下，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被一个个打破了。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6日至20日，中共江苏省委、浙江省委和河南省委也分别作出决定，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节前后南京、杭州、郑州等地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都是革命行动。对于参加当地革命活动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

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审查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要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并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确定了中纪委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纪，切实搞好党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中国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强国富民之路。

二、科学文化的春天

“10年动乱”的结束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呼唤着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两位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鉴于长期存在的轻视科学技术、歧视科技人员的错误思想观念，邓小平同志还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

人也是劳动者。”这里，邓小平同志纠正了“左”的错误认识和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各种诬蔑不实之词，明确地提出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还看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其他战线都比较快地恢复了正常秩序，唯有教育战线积重难返，于是，下决心亲自解决这个难题。1977年8至9月，他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同教育部^①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两次谈到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他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他针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最先提出了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功过的问题。

所谓“两个估计”，指的是1971年在姚文元、张春桥的直接参与下起草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荒谬的估计成了“四人帮”向教育战线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头上经常挥舞的两根大棒，给教育战线的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强烈要求推翻“两个估计”的错误结论。但是，问题很难解决，因为《纪要》是经过毛泽东画了圈的。按照当时还盛行的“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是不能动的。另外，对于知识分子的那个结论也是早在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就讲过的。他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

^① 现国家教育委员会。